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名詞界定

一、研究動機、目的

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歷史，即是一個由多民族國家逐漸形成而發展的過程，其間雖幾經分裂，但仍漸趨向於國家統一及各族融合的整體趨勢。元、清兩朝是典型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權的例子，尤其至清代疆域的奠定不僅在政治上達到空前的統一，使各族間經濟文化等連繫更加緊密。除了與清朝統治者努力經營有關外，亦與相關政策及措施的制定與執行，以及中央與各族人民共同開發創造有關。清朝在邊疆開發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無論是清朝政府的治邊政策、開發措施，抑或各族的開發活動等都有其成功的經驗及失敗的教訓。清朝不僅繼前代漫長之苦心經營，為今日中國疆域格局基本形成，歷代的治邊經驗亦於此時集其大成而形成較完整的體系；且與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相去不遠，對於未來相關政策之規劃及依據亦著實有著淵源關係與深刻影響，值得我們認真去回顧與總結，不但可提供歷史依據，亦有著歷史借鑒的意義。

清朝是由滿族所建立的全國性政權，不僅統治著中原廣大的漢族地區，同時對少數民族居住的邊疆地區也實行有效的管轄，經過康、雍、乾三朝的經營，使這個統一多民族的國家獲得空前的鞏固與發展，奠定中國幅員遼闊的疆域版圖。其政權結構也由以滿族為核心的民族共同體，擴大為多民族帝國，始終皆為「多元一體」的形態。在費孝通先生所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書中，論述直至今日仍保留這樣的民族特點，構成多元的格局。¹因此，在這樣的概念下，對於文化教育的研究也應該要有「多元」的格局，惟檢視以往有關文化教育的研究多偏重漢民族教育的研究，相對於「非漢」民族教育的研究，則多未受到重視。本文研究的初衷即以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為主要觀察視角，作為平衡以往過度注重漢民族教育的研究取徑。

其次，邊疆是一個歷史概念，它隨著國家和民族的成長而逐漸形成及固定。西南地區不僅為政治上的邊疆，被視為「荒服之區，蠻夷之地」為眾多少數民族聚集區，民族種類多而複雜，故常被認定為文化上的邊疆。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的治理，從初期的招撫和

¹ 費孝通論中國的族群關係時，以「多元一體化格局」來概括此一穩定族群的實質，就靜態現象而言，「一體」是指政治的一體，「多元」是指民族的多元或文化的多元；就動態平衡而言，「一體」是指政治上的擬民族，實際上是一個多民族結合而成的族群，「多元」是指在政治主體互動層面下，兼容著若干層次的相互並存的互動圈，而這些互動圈也有可能互相排斥，是以無論從族群成員或族群內部的民族互動關係來看，都具有多元性。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頁1-36。

羈縻政策，實行土司制度至雍正年間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及開闢苗疆，中期以後實施的苗地歸苗與苗防屯政，以至清末的改土歸流，皆有相應的配套及善後措施。上自皇帝，下至執行的督撫官員多重視這樣的善後工作，其中即包括少數民族的教育。正如魏源在《聖武記》中認為改土歸流是「一時之創夷，百世之恬熙」，改土歸流之後對西南地區而言有破壞，亦有建設，「措施」為清廷針對當時的情況所訂定的章程等相關辦法，例如嘉慶元年和琳曾擬定《湖南苗疆善後章程》，有清界址、設營汛、修城垣等等，這些措施是一時的，只有在文教方面的措施則是長期延續性的文化事業；同時，教育政策的實施也是整個政治的體現，甚至包含了一個時代的理念。究竟在這麼多不同民族接觸、交流的過程中，文化教育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為何？清朝政府治理西南地區時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基礎。

再次，至少上溯至明代，對於西南地區已有較系統化的文教政策，迨至清代則更為完備。明清兩朝都十分強調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教化。清朝對於邊陲地區進行開發及政治改革的同時，亦留心文化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進一步在當地推動一系列的措施。自雍正年間以迄清末，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施「改土歸流」，對於打破內地與邊區之間的地域壁壘及加強往來，提供有利的條件。清廷廢除土司制，設立府州縣衙門，委任流官進行統治，其直接目的固然是為了要鞏固中央主權，然而其政策也與內地一樣，目的是把西南地區置於大清版圖「一體」的整體概念下，漸漸彌補以往土司地區的不足及縮短與內地州縣的差距，有利於彼此間的互動交流。除了在府州縣設立儒學和書院之外，並採取對土司子弟教育的加強、設置地區性的義學及增加學額與開設苗科等措施以對少數民族進行教育，即兼重少數民族人才的選拔與培育。清朝政府此種化邊疆為內地的政策使當地族群雜處的社會逐漸整合，不僅使各少數民族漸趨馴良有利其管轄統治，亦在西南地區的教育發展史上進一步奠定較為穩固的根基。

清廷藉由在少數民族地區舉辦教育事業，以儒家學說來實施教化，加強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向心力。滿洲統治者強調教化的重要性，尤其對於邊疆文教政策的擬定與執行雖有強烈的政治意涵，與其「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的統治政策有很大的關係。換言之，清朝政府針對各地區的不同情況，明智地採取不同的統治方針，並落實於相關措施上，研究它將有助於瞭解清朝政府如何借此維持帝國體系和諧穩定的重要性；其次，因為這些措施促進當地開發或開啓民智，是各項進步的重要關鍵，將有助於了解當地進步的軌迹。

在前人的研究著述中雖不乏有關清代邊疆的相關研究，惟多側重於邊疆政治史、軍事史、疆域史、民族史等，較少將邊疆開發所衍生的問題諸如：教育史中文教政策的措施作為專門課題加以研究探討。文教措施雖為諸多措施之一，卻為其政策推行不可忽視的重要

環節，加以深入探索及釐清問題仍有其研究之必要性與學術價值。對於西南地區相關的研究議題，歷來之前輩學者多有論文發表及專書出版，其研究主題多集中在以下幾個面向：第一，有關清代西南地區之綜論著作；第二、對於清代西南地區土司制度及改土歸流之研究；第三、對於清朝政府在西南地區推行的經濟、法治等措施之研究；第四、對於清朝政府在西南地區實施屯田制及苗漢互動關係之研究。由以上可略窺出學界對於清代西南地區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但綜述清代西南地區文教議題的論著卻有限；間或僅論及某省份之教育，或為某項學校教育體系（如書院、義學等），尤其針對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少數民族的文教措施部分，較無宏觀及統整性的研究，因此頗具深入研究的空間。整體而言，關於文教議題上，則呈現較為零星而缺乏整體研究的樣貌，雖然在政策與制度面、各級學校教育、區域教育等或多或少在當地出版之社科類期刊（如《貴州文史叢刊》、《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等）皆不乏有人探討研究，然而以較宏觀的視角，且較長時段跨省區與整體性的研究則付之闕如。結合政策之變遷、各類學校教育與考試制度的實施與當地社會發展的影響，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此外，在理論及方法上，就同一問題提出新觀點、新體認，除了受新的理論被引介而產生，亦由於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史料掌握不同及認識的角度上差異使然。以史學的方法來研究西南的文化教育問題，探究的切入點除了西南文化的融合問題，其發展不僅僅是同化、漢化的問題，亦包括現代化。西南地區的文化教育如何走向現代化？雖然邊疆開發促進了清代邊疆地區較為落後的經濟、社會等面貌的改變，然而這種開發仍多屬於內地社會、經濟和文化模式在邊疆地區的復植，並不具備蘊育新的社會形態的條件。西南的邊疆文化往往是漢文化一個反觀自己的鏡子，彼此間如何去選擇、融合、保存、吸收之外，再如何創新進步，是值得更進一步思考研究的問題。

二、名詞界定

為了讓本文之敘述主軸更為清晰，在此先將本文所指涉相關的名詞加以解釋界定。

首先，對於「西南地區」所指涉的範圍加以釐清與界定。「西南」一詞亦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而言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某種相對的方向和方位，隨觀察主體的改變而變化。當中原漢文化定都長安時，「西南」代表秦嶺以南、巫山以西的區域；三國鼎立時，蜀定都成都，「西南」則縮小為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小塊區域；而在宋室南渡，遷都臨安（杭州）時，「西南」變得遙遠而廣闊。²在長期的歷史記述中，「西南」又有著較為統一的含意（如邊地、治外、蠻夷等）。在《尚書·牧誓》中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

² 楊庭碩、羅康隆，《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新華書店，1992年10月），頁9。

西南夷」；³ 在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則夾雜在匈奴、東越、南越及一些傳奇人物列傳之間，其篇幅尚不及一篇〈扁鵲倉公列傳〉；班固《漢書·敘傳》則謂：「西南外夷，別種殊域」；⁴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寫道：「南方曰蠻，亦曰西南番。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故皆蠻地，……則謂之化外真蠻矣！區落連互，接于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記。」⁵在古今地名中諸如「平彝（夷）」、「鎮南」、「鎮遠」、「武定」等類地名在西南各地可謂不勝枚舉，除了說明西南代表一種方向、方位及一種遠離中原的區域，多少帶有對知之甚少「非漢」文化的暗示，因而將西南歸為「邊疆」有其歷史的淵源與背景。然而從今日的眼光來看，僅就地域而言，狹義的西南地區相當於川、滇、黔三省，⁶廣義的西南地區則還包括藏、桂及湘、鄂西部一些地區。⁷

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共同組成，經過長時間逐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漢族是凝聚核心的主體民族，主要聚集於平原與盆地等適宜發展農業的地區；其他少數民族大部分散居於四方較邊緣的地區，通常稱之為「邊疆」。不論哪一個民族成為統治者，均須兼顧與管轄境內各個民族，因而各朝均有不同的邊疆政策。討論清朝的邊疆政策，首先須弄清「邊疆」的含意。邊疆之定義，一為政治上的邊疆，一為文化上的邊疆。政治上的邊疆，係指一國的國界或邊界而言，所以也是地理上的邊疆，⁸一般稱「塞外」、「域外」、「關外」，相對稱內地為「中原」、「腹地」、「關內」；文化上的邊疆，係指國內若干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生活方式等與內地尚有不同的地區，可謂為「中華民族之文化邊緣」，如黔之苗區，滇之夷區，桂之僑區，其距離國界尚遠，不得謂地理的邊疆；其服膺中央及地方之政令亦甚早，不得謂政治的邊疆，而以其在文化上有不可諱言之差別，乃稱之為文化的邊疆。⁹也有學者認為邊疆是一個歷史概念，它隨著國家和民族的成長而逐漸形成及固定。¹⁰當我們在研究“邊疆”、“邊界”這類概念時，首先應弄清自身對文化背景的邊界線（frontiers）的問題。¹¹綜合以上概念，邊疆的含意應包括地理、政治和文化三個層面。「地

³ 《十三經注》（阮元刻本），尚書，周書，〈牧誓〉，頁158。

⁴ 《新校本漢書》，卷一百下，敘傳第七十下，頁4268。

⁵ （宋）范成大，《叢書集成新編（九十一）—桂海虞衡志》〈志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頁130。

⁶ 西南地區一般認為泛指西南三省即川、滇及黔。劉盛佳等編，《中國地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7年），頁410；方國瑜，《中國西南地理考釋》（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1；楊庭碩、羅康隆，《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新華書店，1992年），頁9。

⁷ 何耀華於《中國西南歷史民族學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所定義西南地區之範圍亦為：川、藏、滇、黔、桂五省；庭碩、羅康隆等人認為廣義之西南地區應為：川、滇、黔、藏、桂及湘、鄂西部一些地區《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新華書店，1992年），頁9。

⁸ 邊眾曾指出：邊疆首先是地理概念，與一個國家的國界線有著密切的關係。簡言之，“邊疆”事指直接與國界相關聯的地區。邊眾，〈論當前開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新華書店，1991年3月）第1期，頁13。

⁹ 曹樹勳，《邊疆教育新論》（臺北：正中書局，1945年），頁3。

¹⁰ 戴逸，〈加強邊疆開發史的研究〉，《清代邊疆開發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7。

¹¹ 關於“邊界線”的問題，王賓曾指出：“邊界線”不是國土意義上的分界，而是一種關係走向，指不同文化圈之間的分隔和關聯。它呈交叉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避免，“異”中顯出“同”，“同”

理的邊疆」主要是指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空間裡，各族群長期活動、交往的廣義邊界，即自然地理的界線。「政治的邊疆」為一定時期裡不同利益團體的勢力範圍，往往隨朝代更替而不斷改變，或拓展、兼併甚而易主，有其週期性的歷史彈性。而「文化的邊疆」之界定較為廣泛與綜合。代表某種相對獨立而穩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下所產生的族群意識與價值觀。每一個文化都有自己的地域中心，由中心向外輻射與延伸，影響力難以到達之處則視為邊界。同時，文化意義上的邊疆又有其相對性與主觀性。許多在地域、習俗等方面明顯接近的族群，由於認同上的對立而彼此認為「非我族類」。¹²王明珂先生則認為這種現象為：人群對於族群範圍的主觀認同，由界定及維持族群邊界來完成，而族群邊界則是多重、可變與可被利用的。並指出：在族群關係之中，一旦以某種主觀標準界定的族群邊緣，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徵被強調出來。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¹³本文所要討論的「邊疆」少數民族，首先應與以往歷史演變相關，亦涉及地理、政治與文化的不同層面。這些民族不僅在政治和地理意義上分布於中國的西南邊陲與內陸高地，在文化上亦屬「多元一體」的結構中，不同的「元」間的相對界線。而其居住的邊陲地區，「邊疆」所指的是一個較大的地理空間，尚可區分為「邊疆外沿」與「邊疆內沿」等外、內兩個意含。「邊疆內沿」主要體現一國之內的族群區別，其開放的特色較明顯，族群間的往來互動較方便。¹⁴本文則趨向「邊疆內沿」即省（區）界內的討論。¹⁵

其次，一般人將西南邊疆與「苗疆」混為一談。清朝之「苗疆」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苗疆」僅指貴州東部以古州為中心的苗族聚集區；廣義的「苗疆」則泛指西南三省（川、滇、黔）、湖廣、兩廣等省的少數民族聚集區。¹⁶此外，「苗疆」一詞亦出自清代文獻，有專稱與泛稱的區別。據嘉慶二十五年（1820）出版之《苗防備覽》觀之，湖南的「苗疆」為鳳凰、永綏、乾州三廳及永順、保靖二縣的千餘苗寨；而光緒四年（1878）出版的《苗疆聞見錄》中稱黔東南「苗疆」即為鎮遠府、黎平府、黃平州、施秉縣及古州、八寨、丹江及都江四廳。一般泛稱為將南方少數民族居住區通稱為「苗疆」，此與「苗」的泛稱有

中包含“異”；並指出“邊界線”永遠存在，因而文化溝通永無止境。王賓等編，《獅在華夏——文化雙向認識策略問題》（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

¹² 徐新建，〈從邊疆到腹地：中國多元民族不同類型——兼論「多元一體」格局〉，《廣西民族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6期（2001年11月），頁8-9。

¹³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77。

¹⁴ 徐新建，〈從邊疆到腹地：中國多元民族不同類型——兼論「多元一體」格局〉，《廣西民族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6期（2001年11月），頁8-9。

¹⁵ 本段「多元一體」的概念來自於費孝通先生所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1999年9月）一書中提到中華民族之多元一體格局是淵遠流長，經各朝逐漸融合，並強調這類民族直至今日保留他們的民族特點，構成多元的格局。同時在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中，存在一個凝聚的核心、一體的過程是逐步完成等等特色。

¹⁶ 如《清實錄（八）·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十九所載：「雲、貴、川、廣、湖南各省為邊省苗疆」，頁23；（同上書）卷一百四十七所載：「雲、貴、川、廣等省苗疆地方，請照臺灣例，令文武官弁互相稽察」，頁8（827）。

密切關係。專稱即是指苗族聚集區而言，據清代文獻等記載之歸類，「苗疆」主要指湘西、黔東北和黔東南這兩個苗族主要的聚集區。¹⁷由此看來，「苗疆」實包括在「西南邊疆」內則是無庸置疑的。西南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區，至少有二十多個少數民族在此地繁衍生息且歷史悠久。然而因各民族及所屬地區歷史不同，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加上自然因素（如地勢險峻、交通不便）等限制，各朝對這些民族地區的統治辦法亦不盡相同。以明清兩朝而言，西南地區在政治上至少有三種形式同時存在：一是流官治理的地方，其各項制度與內地基本相同；二是土司統治的地方（含土流並治的地方），由中央王朝任命當地各部族酋長擔任各級官吏，准予世襲及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三則是既沒有設置流官，亦無土司管轄所謂的「生界」部落。這三種不同的情況不僅使經濟發展、生活水準及風俗習慣等大相逕庭，政治與文化上產生極大差異。在《明史》〈土司傳〉中西南土司分布區域為：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及廣西；而《清史稿校註》〈土司列傳〉則增加甘肅地區。本文以處理清朝政府在改土歸流前後對西南少數民族分布區之文教措施為論述重點，尤偏重於土司統治及「生界」部落地區的討論，故研究範圍較近於何耀華在《中國西南歷史民族學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所定義的範圍：川、滇、黔、藏、桂五省。除去西藏地方因政教體系獨樹一格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更替苗族主要分布之湘西地區【（徐家幹，《苗疆聞見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俾使涉及少數民族措施實施時論述的完整性。本文以少數民族分布最多之川、滇、黔三省為主要中心，然而與其相連接之湘西及桂西等地區，因地理位置有其關連性及該地區在社會等問題上產生共通性，同時受清朝政府注意與提及。此外，據筆者所整理改土歸流後之西南地區改流簡表及行政區域調整來看（參見表 3-1 及 3-2），本文所指稱之西南地區實則為川、滇、黔、湘、桂五省為論述範圍。

關於「文教」一詞，古時指禮樂法度、文章教化。¹⁸《尚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¹⁹漢荀悅《申鑒·政體》：「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²⁰而在清廷的官方文獻中，常出現「文教」或「教化」一詞，從皇太極「文武並用，以武力勘禍亂，以文教佐太平」，²¹順治皇帝「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²²之治國理念至康熙皇帝「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²³若再考察當時其他文獻中出現「文教」一詞的含意，²⁴其意義

¹⁷ 參考梁志源，《清代苗漢關係之研究—以川楚雲桂地區為例（1723-1850）》（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6月），頁16-17關於「苗疆」之定義。

¹⁸ 臺灣中華書局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頁193。

¹⁹ 《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第六卷，夏書，禹貢，頁90。

²⁰ （漢）荀悅撰，黃省會註，《申鑒》（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1978年），一卷，〈政體第一〉，頁2。

²¹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六，頁22。天聰四年四月己卯條。

²²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九十一，頁16。順治十二年三月壬子條。

²³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三十四，頁10-11。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條。

應接近於今日「文化教育」的簡稱。同時，可看出清初諸帝一統的籌邊思想乃建立於對文化之統制及文化的建設，基本上將西南地區與內地視為一體的概念下，制定了相應的邊疆政策及民族政策。對於邊陲地區進行開發及政治改革的同時，亦留心文化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進一步在當地推動一系列的措施。其目的是把西南地區置於大清版圖「一體」的整體概念下，彌補以往土司地區的不足及縮短與內地州縣的差距，將邊疆地區「內地化」有利於彼此間的互動交流。

第二節 研究回顧與檢討展望

一、研究回顧

邊疆學研究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自周秦以降，記述中國邊疆歷史地理、區域沿革、民族風俗、政軍文教、治邊邊防以及邊疆重要人物事件的典籍，卷帙浩繁。有清一代，除爲了奠定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需要，繼而因邊疆面臨的危機，促使許多封疆大吏等關注於邊疆問題，留下有關邊疆的資料典籍、檔案著述等可謂汗牛充棟，可見前人並未忽視對於邊疆問題之研究。

民國以來，學術界研究清代邊疆議題的論著亦復不少。抗日戰爭期間，政府播遷西南，因時勢之趨，對於西南問題的研究，因爲新問題與新材料之配合，蔚成一股潮流，舉凡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民族、社會、歷史、地理、宗教、藝術等均產生了豐碩的成果，亦奠定了基礎。²⁵然而自民國三十八年（1949）後，海峽兩岸，形勢隔離，因時代與環境等因素，在臺灣地區關於此一領域的研究，研究取材與研究方法皆面臨考驗，亟需尋求突破。相較之下，大陸地區則因地利之便，尤其自 80 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同時隨著《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發行，對於中國邊疆之研究全面性開展，除了對於邊疆史地學科本身之框架、模式、性質等多所探討，有關西南地區之研究在內涵上更廣泛而深入地探討，成果亦見可觀。此外，在大陸地區各地以邊疆省份爲主之社科類期刊相繼付梓問世，亦刊載諸多相關論述。尤其近年來對於邊疆問題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邊疆史研究爲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課題之一。近代的邊疆地區，一方面直接承受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而對外交涉，喪權割地多是以邊疆地區爲對象，邊政一直成爲政治、外交、社會等問題的重要部分。如何有效維持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似不能忽視對邊疆問題的研究，多數課題仍具開拓性。

²⁴ 例如：在《寶慶府志》卷九十三，禮書內載：「國家重道崇儒，昌隆文教，海隅徼塞，萬里之外莫不有學。」；乾隆五年（1740），屠用中於〈敬陳南巢善後事宜詳文〉內稱：「德勝地方，宜設立義學，一以廣敷文教，一以暗制群蠻也。竊謂教化不興，恐巢賊革面未必革心，今應於德勝地方起設義學」等。

²⁵ 辛法春，〈近四十年來西南邊疆地區的研究論著內容分析〉《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臺北：渤海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頁 825。

近二十餘年來，至少自 1991 年以後，在大陸地區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中國邊疆史地學儼然已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又是一門“與眾多學科相關的交叉學科”，²⁶關於邊疆文教相關議題之研究成果遠較過去可觀。而在臺灣地區，近年來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研究方法與理論上均有顯著改變，對於研究方法與理論的重視，以及學科間互相交流與敬重、互相需求已在學術界呈現。歷史人文科學需要社會科學的解析技術與方法，社會科學亦需要歷史學中對於文獻的掌握、決定與運用的訓練。易言之，兼顧社會科學的方法，包括對於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了解，可看出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間彼此之互補性。西南地區之研究所涉及問題廣泛，諸如邊疆史地理論、歷代疆域、邊疆民族、治邊政策、邊疆開發、邊疆政教、邊疆人物等，欲從各角度探究西南地區之各種面向問題，以個人之力研究實屬有限。目前就有關西南地區的研究題目與性質觀之，特色為研究課題多樣化，研究範圍亦不再偏重政策與制度面之探討。

關於文化教育等課題之研究為數至夥，間或有論及個別省份或某項教育體系之研究，而社會教化、區域教育等議題亦漸受研究者重視，的確為一可喜的現象。在探討之先，有關西南地區邊疆政策與邊疆開發等相關背景的綜合論述成果豐碩，²⁷學界對於西南地區民族政策向來關注，而民族政策往往牽動著當地文教發展的走向。例如：馬汝珩、馬大正主編之《清代的邊疆政策》一書，則論述清代邊疆政策中一些全局性之重大問題，其中包括對西南地區“恩威並施”與“因俗而治”的治邊方針，邊疆政策的基本內容與歷史評估，以及近代邊疆危機與邊疆政策之變化等。這些著述基本上是從整體對清代邊疆政策進行綜合評價，既充分肯定其促進中國多民族國家鞏固與統一，以及有利於民族融合、邊疆經濟開發等客觀積極的作用，並對清朝政府所推行整體邊疆政策之保守封閉性質，作頗為切中要害之分析；惟對文教議題均屬概略性的敘述，鮮少作深入的探討。伍新福²⁸、程昭星²⁹則強調民族的統治政策不可避免的有其階級的和歷史的侷限性，然而某種程度上做到因地制宜的因俗而治，並能根據具體情況適時進行讓步與調整，頗具靈活性，亦為清王朝能在南方

²⁶ 邊眾，〈論當前開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一期（1991），頁 13-16。

²⁷ 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年）；吳永章主編，《中南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年）；尤中，〈明朝對西南各民族地區的設治與經營〉《思想戰線》第 3 期（1992），頁 54-60；〈清朝對西南民族地區的設治和經營〉《雲南社會科學》第 3 期（1993），頁 68-77；〈元朝對西南各民族地區的設治和經營〉《思想戰線》第 2 期（1995），頁 39-44；馬汝珩、馬大正主編，《清代的邊疆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4 年）；伍新福，〈試論清朝前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貴州文史叢刊》第 2 期（1986），頁 16-22；程昭星，〈試論清代中央政權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政治改革及其意義〉《貴州社會科學》第 12 期（1991）；范同壽，〈清代前期治黔述論〉《清史研究》第 1 期（1993），頁 73-82；馬汝珩、成崇德主編，《清代的邊疆開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張世明，〈從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看文化因素的影響〉《清史研究》第 2 期（1991），頁 38-43；〈清代前後期藏族地區開發的比較研究〉《中國邊疆史地論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0 年）。

²⁸ 伍新福，〈試論清朝前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貴州文史叢刊》第 2 期（1986），頁 16-22。

²⁹ 程昭星，〈試論清代中央政權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政治改革及其意義〉《貴州社會科學》第 12 期（1991）

統治頗為成功之因。范同壽³⁰認為治理像貴州這樣的邊疆民族地區，僅圍繞統一政令，發展經濟以制定政策和措施是不夠的。統治者必須重視當地的民族問題，體認民族關係在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為本文有關文教議題的研究提示重要的研究視角。

其次，土官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問題，仍然為西南地區研究之重點，成果亦豐，³¹惟較缺乏強調在土司土官制度下對於一般土民的愚民政策，以及針對改土歸流後的善後措施內文化教育改善措施的研究，此亦為值得探究的議題。近年來對土司制度研究的一個特點，則是探討土司家族及其演變的文章明顯增多，一些文章並將土司設置與西南地區疆域的變化相結合。³²其次，對近代西南邊疆地區的改土歸流，過去研究並不多，針對文教議題者更為少見。³³近年來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已不限於土官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內容、意義和影響等作一般性的討論，除了頗具深度的整體研究外，³⁴亦應加強敘述制度在各省區的施行並結合具體問題研究的趨勢，例如改流後的善後措施推行的相關研究。

再者，西南邊疆為多民族雜居地區，除了土著民族外，歷代都有不少漢族（某些時期是北部的少數民族）人口遷移至西南邊疆，共同建設與開發西南地區，對於當地社會文化之影響則不容忽視。關於西南地區民族關係的研究，主要研究趨向為土著民族與外來人口的關係。³⁵邊疆地區疆域的形成與鞏固，與外來人口進入邊疆和邊疆地區各民族間的互動，

³⁰ 范同壽，〈清代前期治黔述論〉《清史研究》第1期（1993），頁73-82。

³¹ 例如：李世愉，〈略論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史繼忠，〈略論土司制度的演變〉《貴州文史叢刊》第4期（1986），頁1-11；龔蔭，〈土司制度的作用與流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1989）；〈西南諸省土司設置及演變概說〉《民族研究》第1期（1993），頁49-58；林荃，〈雲南土司制度的歷史特點及分期〉《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93），頁45-49。

³² 例如：肖迎，〈怒江地區土司建置沿革考〉《中國民族史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王璞，〈明代雲南的麗江木氏土司〉《中國民族史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曉根，〈拉祜族地區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1998），頁19-23；粟冠昌，〈清代廣西土官制度改流述議〉《廣西民族研究》第1期（1990）；〈清代廣西土官制度的衰落〉《廣西民族研究》第1、2期（1991）；余宏模，〈試論清代雍正時期貴州的改土歸流〉《貴州民族研究》第2期（1997），頁26-34；〈試論清朝前期貴州的土司制度〉《貴州民族研究》第1期（1997），頁74-82。

³³ 目前研究仍以清末改土歸流為論述主軸，例如：王文成，〈近代雲南邊疆民族地區改土歸流述論〉《民族研究》第1期（1993），頁41-48；〈土流並治在近代雲南邊疆的全面確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1993），頁29-34；董守義，〈清末改土歸流決策論〉《史學集刊》第1期（1992），頁40-45；張秋雯，〈清末巴塘變亂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期（1981.7），頁227-244；何一民，〈二十世紀初年川邊藏區政治經濟文化改革論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2001），頁50-60；林俊華，〈從“土”到“流”的歷史趨勢—試論“川邊改土歸流”的歷史背景〉《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1卷第2期（2002），頁18-23。

³⁴ 趙雲田，〈清末川邊改革新探〉《中國藏學》第3期（2002），頁38-48。

³⁵ 例如：葛劍雄，〈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藍勇，〈西南歷史文化地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1997年）；郝正治編，〈漢族移民入滇史話〉（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蒼銘，〈雲南民族遷徙文化研究〉（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古永繼，〈明代雲南的謫流之人〉《思想戰線》第1期（1992），頁84-89；陳斌，〈試論明清時期瑤漢民族的融合〉《思想戰線》第1期（1991），頁71-75；羅康隆，〈明清兩代貴州漢族移民特點的對比研究〉《貴州社會科學》第3期（1993），頁104-108；蘇建靈，〈明清時期漢族人口向壯族地區的遷移〉《廣西民族研究》第1、2期（1999）；何毛堂、李輝南，〈土司制度對桂西民族融合的促進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87），頁48-52；李昭賓，〈清代中期川陝楚地區流動人口與川陝楚教亂（1736-1820）〉；梁志源，〈清代中期苗漢關係之研究—以川楚雲貴地區為例（1723-1850）〉等。

均有密切的關係。整體而言，統治者從鞏固邊疆地區的統治的目標出發，在向邊疆移民和處理邊疆地區的民族關係等方面，有哪些考量並相應的採取哪些治理對策，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為本文提供思考的方向。此外，西南邊疆地區外來移民和本地民族關係之發展，是在哪些因素影響和制約下形成的？對於上述類型的民族關係，以及因此關係所造成西南地區發展演變的複雜影響，頗值得深入研究。目前關於近現代西南地區民族關係的探討迄今還討論不多，也是頗待加強研究的一個範疇。

以下將西南地區教育、文化等議題研究，分為以下幾個面向回顧：

1. 有關教育政策與制度及教育史之研究

教育政策是統治者整體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代的統治者皆明白「亂世用武，治世用文」的道理，在「以武功定天下」的同時，亦重視「以文德治天下」。明清兩朝在西南地區推行的教育政策，絕大部分仍與全國一致，然而亦針對西南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成份的差異，相應採取一些特殊的教育政策。在多民族或多元文化的國家中，少數民族教育是在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相互影響中存在和發展的，其能保持自身民族教育的特色，主要取決於自身的各種因素及其文化教育的特點，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體民族文化教育的影響。在此部分，葉高樹之《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以清朝統治者從學習、選擇、接納漢文化，至維護本族特質的歷程作為討論的主軸；並就「征服政權」與「中原政權」二重特徵的角度，分別就統治意識、繙譯漢籍、官修史書、思想控制、編定群書及國語騎射等主題，再以清朝前期諸帝的治術為聯繫，探討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如何凝聚出既富有滿洲特色，又融合中國傳統的集體價值觀，以期闡明文化政策與維持帝國體系和諧穩定的重要性。³⁶此外，安永新、沈其榮、薛麗雲、蔡壽福、王錫宏等人亦有深入研究。³⁷王笛則討論清末「新政」與四川近代教育的興起的關係。³⁸清朝政府宣布「新政」之始即將「興學育才」置於首位，不僅奠定四川教育的基礎，亦與日後四川辛亥革命有直接的關連。同

³⁶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

³⁷ 安永新認為明清兩代都十分注重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教化」，除在各宣慰司、宣撫司及府、州、縣、衛設立官學和書院外，亦採取諸多措施例如：重視土司子弟教育等。雖然其目的是為了鞏固政權，受教育者亦多為土司、官吏與有錢人家子弟，然而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漢族文化亦得以進入貴州地區，而外地的知識分子亦得以進入貴州，在貴州受教育者藉由科舉考試的途徑至全國各地，加強了貴州與其他地區的交流互動；安永新，〈封建教育制度在貴州的形成和發展〉《貴州文史叢刊》第3期（1991），頁75-82；〈明代至解放前的貴州民族教育〉《貴州文史叢刊》第3期（1989），頁73-86。沈其榮則強調雲南是一個多民族的邊疆省份，民族教育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並認為師資不足才是影響教育的發展和質量之因。師資問題的確是影響和決定教育質量的優劣及教育發展的速度，夏長雲即注意到西南邊疆師資問題的重要性。薛麗雲、蔡壽福則將少數民族接受漢文教育的歷史加以闡述。明代以後，雲南漢族人口逐漸占為多數，使漢文化教育進一步發展，在民族雜居區辦學較為普遍，對於少數民族亦多有優惠的教育措施，但因地理位置、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幾起幾落，步履艱難；王錫宏則認為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既受教育規律的影響，亦受民族發展規律的影響。王錫宏，〈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民族學思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1996），頁158-164。

³⁸ 王笛，〈清末「新政」與四川近代教育的興起〉《四川大學學報》第2期（1985），頁95-112。

時近代學堂逐步取代舊式書院、學塾，使四川風氣日開、人才輩出。與此議題相關者，尚有鍾霞、張小莉、陳敏、劉曉紅及黃加文、曾紹東等人的研究，³⁹惟有關清末「新政」對於西南地區整體近代教育興起的研究，目前尚無統整性的研究。

有關西南地區考試制度部分，隆名驥⁴⁰則探討清朝在乾嘉苗民起事（1795-1806）之後，在苗疆地區針對苗族科舉制度的特殊政策，即為「邊額」的設置，認為邊額是歷史的產物，客觀上造就苗疆地區一批知識分子，改變苗族地區的社會結構，亦提高苗族人民的文化素質，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劉光智⁴¹則將科舉制度在雲南地區施行情形與內容作完整的分析。在政治環境與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後，教育制度相應為之改觀，在多民族地區「興學育才」只著眼於漢族是根本行不通的，而在教育形式內容上都必須適應民族地區的特點，是值得參考的一個重要視角。

西南邊疆教育的政策除了政治、經濟、師資等因素的制約外，民族構成的複雜性與分布的分散性，則是邊區教育須面對的問題。教育的發展需考慮當地共同性與特殊性的關係，由於少數民族地區各族文化發展與水準不同，甚至同一民族內部的發展也不平衡，須訂定一套既可遵循一般教育普遍性規範，又能兼顧當地特殊民族的規律，在學制、課程設計、規章制度等需多作考量。對於相關的研究則仍有發展的空間。

2.有關西南地區各級學校教育、區域教育之研究

清代在教育史上為一承先啓後的重要轉折時期，官學、書院，社學、義學較之明代更有所發展。社學、義學大抵屬於蒙養教育的範圍，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教育史上特色之一，小川嘉子認為鑑於明末書院的自由思想導致明朝滅亡，清初對書院的箝制形成當時教育及學術的空白，政府壓制書院、獎勵義學，使義學獲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並認為義學的建置，是近世中國村落生命共同體中，屬於教育的一環，與育嬰堂、養濟院、清節堂等社會救濟設施一樣，是村落內部互相救濟，謀求福祉的一項措施；⁴²而何炳棣的研究則指出明清時代的社學、義學的普遍，擴大了教育機會，使貧寒子弟在仕進之途有了立足點的平等，促進了明清社會向上流動的趨勢。⁴³此外，張羽瓊、蔣立松、王綱等人亦分別針對義學、社

³⁹ 鍾霞，〈清末新政與邊疆地區的現代化——以廣西為例〉《學術論壇》第11期（2005），頁152-155；張小莉，〈清末「新政」時期政府對教育捐款的獎勵政策〉《歷史檔案》第2期（2002），頁113-118；陳敏，〈在歷史進步的背後——清末新政時期學堂教育發展缺失論〉《寧夏社會科學》第4期（2004），頁88-92；劉曉紅，〈淺談清末「新政」後的教育改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4期（1999），頁64-66；黃加文、曾紹東，〈論清末「新政」時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響〉《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1期（2002），頁19-23。

⁴⁰ 隆名驥，〈「邊額」考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8），頁35-39。

⁴¹ 劉光智，〈科舉制度在雲南的興廢〉《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1986），頁102-106。

⁴² 小川嘉子，〈清代に於ける義學設立の基盤〉，收於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昭和33年3月），頁281；頁307-308。

⁴³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209-211.

學及書院等各別地區的教育加以探討。⁴⁴ 關於近代教育的部分，西南地區因地處西南邊疆，經濟、文化較為落後。清末新政及新學風氣傳入的影響，加上一批熱心教育人士的倡導，新式學堂逐漸興起，夏長營、婁述之、蔣德學、劉光智等人均針對此一時期分別以不同類別的教育加以研究探討。⁴⁵ 近年來區域研究風氣勃興，區域教育研究亦隨之出現。關於西南地區的區域教育研究，姚熾昌、李毅然、徐德應、吳崇津、林俊華及梁甌第，在對於當地義學、書院的興衰、小學堂的興起與國民學校的興廢加以介紹與分析。⁴⁶ 桑兵則是以新式學堂教育所造成的學生群為討論主體，試圖了解接受新式教育及接觸西方新知的學生，如何與傳統社會產生矛盾？又如何致力於社會民主化，造成社會結構的轉變。⁴⁷ 另一位美國學者莎莉·波斯維克（Sally Borthwick）則試圖了解中國如何從傳統教育發展至新式教育，著重於社會各階層在新式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研究跳脫注重教育制度與思想研究的方式，提供近代教育的另一種面向；⁴⁸ 日本學者阿部洋則著重於中國近代教育中學堂經費和社會民眾關係，並對清末各地毀學情形進形分析量化的統計研究，勾勒出新式教育對於近代社會群眾生活的影響。⁴⁹

⁴⁴ 張羽瓊首先把“義學”定義為以貧寒子弟為教育對象的免費蒙學。並認為清朝政府推行“改土歸流”以後，在西南地區大力發展義學，將它作為向各族人民施行“教化”的重要工具，認為興辦義學的政治作用大於社會教化作用。張羽瓊，〈論清代貴州義學的發展〉《貴州文史叢刊》第1期（2002），頁55-60；蔣立松則認為雍、乾、嘉、道時期貴州社學與義學的發展是坎坷艱難的。大批義學遷徙不定或寄址於寺廟，辦學條件十分艱苦，加之各義學恆產不多，且官員侵蝕等情況，舉步維艱，是以辦學的客觀條件來看貴州義學的發展。不過他認為社學、義學仍對此時期貴州文化教育的發展產生影響，其目的雖在“化導”，但亦積極推動漢文化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同時有協助貧寒子弟接受教育的社會功能，看法與張羽瓊顯有不同。蔣立松，〈清朝前期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社學、義學發展述略〉《貴州民族研究》第4期（1998），頁137-141。王綱認為清代四川書院的創辦、恢復、發展等，無論從數量、規模和影響皆巨，對於四川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科學技術等方面貢獻很大。不僅為清朝政府培育大批地方官員，亦造就較高水準的知識分子，同時對保存文化典籍及在文化基礎教育方面均有所貢獻。王綱，〈清代四川書院略論〉《清史研究》第1期（1991），頁12-17。

⁴⁵ 夏長營說明清代貴州的師範教育機構以貴陽為中心，因地方財力的困窘使貴州的師範教育時興時廢。夏長營，〈清代貴州師範教育〉《貴州文史叢刊》第3期（1988），頁83-86；婁述之說明清末的中學堂分官立、公立兩類，並將貴州中學教育的教育宗旨與內容、課程設置與管理加以闡述。婁述之，〈清末貴州中學教育考略〉《貴州文史叢刊》第3期（1990），頁89-92。蔣德學則說明貴州社會因經濟發展的需要亟需培育各項實業技術人才，此為職業教育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認為職業教育不僅為全國社會大變革的產物，亦為貴州社會變革的先導，許多從外省聘來的教師或外國教師，在傳播西方先進思想與開啟民智上皆有促進的作用。蔣德學，〈清末貴州的職業教育〉《貴州文史叢刊》第4期（1986），頁29-33。劉光智說明雲南僻處西南一隅，文化教育向來落後於內地。清末因大勢所趨，教育制度也跟著變化，各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尤其在邊疆地區開辦“土民小學”是雲南少數民族歷史上的一項創舉。雲南民族研究所編，劉光智著，〈雲南近代小學教育的建立與發展〉《民族研究文集》（昆明市：雲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6月），頁241-259。

⁴⁶ 姚熾昌，〈明清時期錦屏的辦學情況〉《貴州文史叢刊》第4期（1988），頁67-70；李毅然，〈清鎮教育發展與人才造就〉《貴州文史叢刊》第1期（1992），頁125-130；徐德應，〈台江近代學校的發展及其社會條件〉《貴州文史叢刊》第1期（1991），頁67-72；吳崇津，〈明清及民國時期惠水縣教育概況〉《貴州文史叢刊》第2期（1992），頁54-57；林俊華，〈甘孜藏區學校教育開發史探討〉《西藏研究》第2期（1993），頁39-46；梁甌第，〈川康區保羅之教育〉《西南邊疆》第1期（1987），頁16-22。

⁴⁷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

⁴⁸ 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⁴⁹ 阿部洋，〈中國近代學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學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1993年）。

3. 有關西南地區文化議題之研究

中國歷代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邊疆民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創造與綿延有其直接或間接的貢獻，中原文化對於邊疆文化也具有兼容並包的精神。因此，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現象、風俗習慣自然不能忽略；欲了解中原文化，亦不能忽略邊疆文化之作用與影響。清代“改土歸流”後對於西南各民族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學界對於當地之文化發展亦多論述。李漢林、趙世林、宋恩常、黃新學、陸科閔及劉嚴付、向曉東等人分別從生活習慣、文化傳承、習慣法及社會風俗的改革等角度切入研究。⁵⁰楊庭碩、羅康隆合著的《西南與中原》則為系統地運用民族學的理論，以西南與中原的關係深入而細緻地探討西南與中原的文化互動關係，以及多民族地區的現代化途徑，提出西南各地自我更新的原則和可嘗試改善的分析指標，見解頗為獨到，是一部大架構的作品。⁵¹

清朝政府在確認了“教化為本”的治理原則後，除了對教育的重視，亦逐漸形成完善的鄉村社會教化體系。關於教化的議題，王先明、尤永斌對於清代鄉村社會教化體系之形成、發展及其演變之作出深入而詳實的探討。⁵²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化體系的確是朝廷須面對的棘手問題，其成敗攸關朝廷的興衰。清王朝入關之後，在接納儒家文化和明朝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套比較成功的鄉村社會教化體系，用以對鄉村社會的廣大民眾實行思想控制，官方主要有社學、書院和保甲組織；此外非官方的宗族、鄉約、私塾和義學亦扮演教化的重要角色。除了常規性教化組織外，一些非官方的教化形式如宗教、戲曲等，也具有教化的功能。然而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導致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的劇變，從而使得清王朝傳統的鄉村社會教化體系發生歷史性的變遷，為相關研究提示重要的方向。

4、有關西南地區邊臣疆吏等歷史人物的研究

邊臣疆吏對於邊疆地區政策或措施的推行成效，以及其施政對當地的影響，關係密切。

⁵⁰ 李漢林則從生產工具、生產組織結構、生活習俗等的變遷進行分析；李漢林，〈文化變遷的個例分析—清代“改土歸流”對黔中苗族文化的影響〉《民族研究》第3期（2001），頁74-78；趙世林說明文化傳承的機制和規律，重要的文化傳承和有意識的文化藉此得以延續，就雲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而言，叢林、火塘、寺廟、學校等都是主要文化傳承場，學校漸居重要地位。趙世林，〈民族文化的傳承場〉《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94），頁63-69。宋恩常則將漢字在傣族社會中的傳播時間、傳播方式及與傣族傳統語言的關係及其影響作詳實的介紹與分析。宋恩常，〈漢字在傣族社會中的傳播及其演變〉《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1991），頁25-28。黃學新、陸科閔說明在黔南侗族自治州內的一塊改革風俗的《永定風規》石碑，分析其社會意義，在革除當地弊端（還娘頭）以及完整保存當地改革彩禮習俗的過程，皆有其貢獻。黃學新、陸科閔，〈侗族《永定風規》碑與它的社會意義〉《貴州文史叢刊》第3期（1986），頁113-116；劉嚴付、向曉東，〈趙爾豐對川邊藏區風俗的改革〉《四川檔案》第期（2001），頁38-39；李廷貴、酒素李對苗族歷史文化中“習慣法”作出深入而精闢之研究，其社會功能與制約效力絲毫不遜於成文法。並認為要研究苗族之歷史文化，加強苗族地區之法制建設，皆須從了解苗族“習慣法”著手。李廷貴、酒素，〈苗族“習慣法”概論〉《貴州社會科學》第5期（1981）。

⁵¹ 楊庭碩、羅康隆合著，《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⁵² 王先明、尤永斌，〈略論晚清鄉村教化體系的歷史變遷〉《中國近代史》第8期（1999），頁4-12。

邢玉林〈擴大邊臣疆吏研究的視角〉⁵³是近年來研究邊疆歷史人物中強調理論性的論述，提示對邊疆人物的研究方法與途徑。針對西南地區個別人物的研究，例如：王纓⁵⁴、劉本軍⁵⁵對於鄂爾泰之研究，強調其確立改土歸流的方針，提出改流的目的、措施及策略並有效地推行，使改土歸流與解決當地民族問題和促進邊疆開發緊密結合，為清代前期歷史和西南民族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此外，另有伍新福、龍尚學，以及劉毅翔、譚佛佑、鍾霞、何一民、張秋雯、盧雪燕等人分別對於西南地區之邊臣疆吏作出個別的研究。⁵⁶羅威廉(William T. Rowe)則對於陳宏謀在雲南的施政及教育作分析研究，強調陳宏謀以「教養」二字作為施政的根本；其次，在其研究中認為陳宏謀重視文化的價值、婦道規範、社會準則，以及公共生活的和諧等思想，這些成為日後中國教育的圭臬。⁵⁷

二、綜合檢討與展望

整體而言，關於前述幾個面向的初步分析仍以綜論西南邊疆地區的民族政策與邊疆開發議題受到較多的關注，且仍較偏重於清代前期之研究。然而，溯源的研究固然重要，要理解與掌握現今西南各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的由來與現狀，則不能忽視近代以來的研究；此外，對於各時期治邊思想或非決策人物的治邊思想，以及在治邊思想下所產生的治邊政策，有其形成與發展過程，頗值得深入探討，仍是稍嫌薄弱的研究範疇。同時對於治邊政策或邊疆開發，較缺乏與其他邊疆地區差異性與類比性的研究，亦值得加以比較研究。

在元明清三代的土官土司制度和明清的改土歸流的研究部分，近年來雖已不限於土官

⁵³ 邢玉林，〈擴大邊臣疆吏研究的視角〉《中國邊疆史地論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

⁵⁴ 王纓，〈鄂爾泰與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清史研究》第2期（1995），頁32-39。

⁵⁵ 劉本軍，〈鄂爾泰改土歸流的善後措施〉《雲南社會科學》第6期（1999），頁72-78。

⁵⁶ 伍新福探討苗民在“乾嘉起事”後傅鼎在治理湘西十餘年間實施的政策措施，建立“苗防屯政”的體制，同時與和琳的《湖南苗疆善後章程》做一比較，認為他在文教化導方面的政策是成功的。伍新福，〈傅鼎“治苗”政策評述—兼析與和琳《善後章程》的異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0），頁26-32；龍尚學則對賀長齡撫黔事蹟作完整的介紹，對其咨訪民瘼、勤求吏治、獎勵農桑、振興文教、重視修志等治蹟，使貴州農業經濟與文化教育得以發展，給予高度的肯定。龍尚學，〈試論賀長齡撫黔〉《貴州文史叢刊》第3期（1986），頁66-72。在近代人物研究部分，劉毅翔、譚佛佑分別論述黔省遵義名士黎庶昌對於近代教育改革的貢獻，將西方文明資訊傳入貴州，在貴州維新史上有其重要的影響力。劉毅翔，〈貴州開眼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貴州社會科學》第9期（1992），頁41-46；譚佛佑，〈論黎庶昌對中國近代教育的貢獻〉《貴州文史叢刊》第3期（1992），頁93-98；鍾霞⁵⁶對張鳴岐之研究，清朝政府在全國推行新政，時任廣西巡撫的張鳴岐抓住契機，面對廣西地處邊陲、民智未啟然而資源豐富，全力推展其施政理念，致力於廣西各項事業的建設，促進廣西的近代化。鍾霞，〈張鳴岐與清末廣西近代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3卷2期（2003），頁48-57；何一民則研究對四川新政改革有所貢獻的川督錫良，使晚清四川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皆發生重要的變化，推動四川社會的近代化。何一民，〈錫良與晚清四川近代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1993），頁87-93；張秋雯、盧雪燕二人則以趙爾豐的歷史角色為中心，針對川邊改流相關問題及其影響作出評價。張秋雯，〈趙爾豐與瞻對改流〉（臺北：蒙藏委員會，2001年8月）；盧雪燕，〈趙爾豐經營川邊之研究（1905-191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12月）。

⁵⁷ William T. Rowe, *Education and Empire in Southwest China: Ch'en Hung-mon in Yunanman Benjamin, Woodside, Alexander, e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n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內容、意義和影響等一般性的探討，已出現上述制度在各省區的施行並結合具體問題研究的趨勢，頗具深度的整體研究雖有，但仍不足，尚待努力。土司土官制度對於邊疆民族關係和各民族對於內地文化的認同感，以及對邊疆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除了微觀的研究分析，宏觀的整體研究則顯不足；對於歷史事件鋪敘的比例亦高，對於相關理論探索則尚待加強。此外，西南地區外來移民和本地民族關係之發展，是受哪些因素制約和影響，及造成複雜的演變，是頗值得深入研究的範疇。

除了受近年來多元文化教育所引發的研究趨勢外，綜合前述幾個面向研究的初步分析，不難發現兩岸關於西南地區邊疆及文化教育之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相差極為懸殊。大陸學者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對於涉及民族意識之相關研究仍不自覺較偏向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佔比例仍屬偏高。不過自 1990 年以後，已逐漸走出以馬克思理論研究中國史所出現的困境，並挾其地利之便，以及人力資源之充足，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為主導，加之以西南地區省份為主的相關社科類期刊，不斷登載有關西南研究的論文，遂於此領域中擁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不過，大陸地區研究論文雖在數量上雖佔優勢，然而卻水準不一。也因改革後起步較晚，對於西南研究仍較欠缺對於整體西南文化以及對西南變遷連續而全面的研究，仍存在許多觀念和方法上的含混以及西方理論術語的簡單套用的現象。部分研究篇幅不大，似欠缺深度與廣度；同時解讀史料與理論方法的運用仍嫌不足，在「質」的部分，須加強與外界的學術交流，吸收相關的理論與方法，提升質的水準。

反觀臺灣地區，環繞西南這個主題領域的研究，基本上仍是偏低的。就西南邊疆與文教議題而言，尤其是教育這一門類，研究者實屬寥寥。邊疆教育的檢討、回顧、展望與芻議益顯值得學者們探研。臺灣地區之研究論文在素質上一般而言具有一定水準，在解讀史料與史料運用上亦較嚴謹。也許早期囿於客觀環境的影響，惟恐紙上談兵，相對反映在西南地區相關議題之研究。近年來隨著方法論的突破與更新，研究取材的領域亦隨之擴大，不再侷限於傳統史料上。僅就紙上資料而言，方志、族譜，與社會學、民族學調查報告的大量採用，加之以電腦網絡資訊的不斷翻新，均足以顯示近年來在研究取材的擴增。如何強調西南地區的特色及西南地區相關研究的突破與創新，還是在於研究方法與理論的拓展與更新。近年來臺灣地區受西方史學的影響，亦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趨勢，除了增加跨學科的合作與研究，多加強在研究成果上「量」的提升，注重研究人才的培訓，同時加強兩岸間學術上的交流與對話，重視彼此的研究動態，並建立合作關係，期能促進西南地區相關議題的研究進一步發展。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將運用傳統歷史學文獻分析法為主，並作相關議題之量化統計，進行分析研究。同時，在處理少數民族之人文與社會背景資料部分，亦須援用教育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概念。本文在資料運用上，主要以各類檔案資料為主，即以目前大陸所選輯出版清代官方檔案文書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各類檔案資料為資料來源，即《軍機處·月摺包》、《奏摺檔》、《外紀檔》等檔冊及該院所出版之檔案史料彙編，如《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及根據該院所藏奏摺影印之《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等，以及該院所藏有關西南地區之地方志亦為重要參考資料。此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內閣大庫檔案所出版之《明清檔案》亦將參考應用。至於大陸地區所藏的清代檔案，目前因客觀因素未能前往參考使用，僅能就其出版品加以利用，如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之《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雍正朝起居注冊》等。就性質而言，此類檔案史料主要為地方臣工進呈皇帝的書面報告，屬清史研究之直接史料，故擬從上述檔案中爬梳相關資料，再加以整理分析。再者，方志的內容多樣、廣泛而全面，亦有「資政輔治」的作用，清代西南地區各省地方官方所編修的方志，在內容上雖繁簡不一，水準或有參差，然而對於該地區的教育皆有所記錄，亦值得分析研究。在已刊史料部分，將參閱地方官員之文集、大陸已出版之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報告、報刊雜誌等，並蒐羅教育史發展論著、近人相關學術專著等，期能以豐富翔實的資料為基礎，對此一課題作深入探討。

二、章節架構

清朝對於西南等邊陲地區進行開發及政治改革的同時，亦留心文化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進一步在當地推動一系列的措施。其目的是把西南地區置於大清版圖「一體」的整體概念下，漸漸彌補以往土司地區的不足及縮短與內地州縣的差距，有利於彼此間的互動交流。除了在府州縣設立儒學和書院之外，並採取對土司子弟教育的加強、設置地區性的義學及增加學額與開設苗科等措施以對少數民族進行教育，即兼重少數民族人才的選拔與培育。本文之研究重點，將探討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具體的文教措施：包括學校教育、科舉考試等為論述主軸，尤以涉及少數民族的之措施為主，從教化的觀點切入，闡述清朝政府如何針對西南地區的特性制定相關的民族政策與文教政策，以其於西南地區的治理為背景，經過各朝沿邊督撫等官吏推展，所呈現之成果及影響。

在章節安排上，除緒論和結論外，本文共分為四章。第二章〈西南地區文教措施之實施背景〉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西南地區的人文地理及社會背景〉則以經濟生活、政治

社會及文化教育三方面說明清代以前西南地區的發展狀況及亟待清朝政府解決的問題。第二節〈清朝對西南地區的治理政策〉，在緒論中已釐清西南「邊疆」與「苗疆」的界定，而邊疆政策與國家構成的體制以及民族思想意識的變化相關，清初諸帝的邊疆政策的思想淵源多少依循歷代邊疆政策中民族統一的概念發展模式，清初諸帝大一統的籌邊思想及其政治智慧，反映在治理西南地區問題的態度上，制定相應的邊疆政策及民族政策，進而推動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三節〈清朝政府政策之確立及其施行〉，則敘述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的治理如何由清初的招撫和羈縻政策，轉變為雍正朝以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的實施與苗疆開闢，以及中期以後「苗防屯政」與「苗地歸苗」等政策的施行作分析闡述。

第三章〈西南地區學校教育與科舉考試的實施〉共分爲三小節，第一節〈行政區域之調整與學校教育機構之設置〉，改土歸流後，除了部分地區仍保留土州、土縣等小土司，絕大部分的土司及新闢苗疆地區，皆設府治、州、縣等實施與內地一致的行政制度，同時隨後設學校及開科取士，加強當地的文教工作。對於偏遠極邊地區就學不便的子弟亦未嘗忽視，在適當的地區設立地方儒學及考棚鼓勵其努力向學，倡導並傳播儒學及倫理道德，欲從精神層面加強對於這些少數民族的統治，同時也為清朝政府培育管理的人才，是清朝政府重視當地文教工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其次，針對邊疆地區師資缺乏，特予部分地區的學官諸多優惠的措施以示獎勵；由於改流之土司田業及逆產，以及農村市集等稅收挹注，使地方儒學在經費收入部分較為穩定，有助於儒學的正常運作。由於疆域的遼闊，地方儒學的發展因歷史人文及民族風土之不同，清朝政府既要顧及各民族原有的文化背景及其差異性，又須兼顧朝廷統御邊疆地區的戰略利益，自然對於不同的邊區及民族，採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儒學的發展模式，亦因此而多有參差。亦透過加額取進、學額調整與增廣學額等優惠措施增加少數民族入學與中舉的機會。第二節〈西南地區書院的設置與發展〉，首先簡略交待清代以前及清代書院的設置與發展背景，作為清代西南地區特殊的人文地理與社會背景下所發展出來的書院教育比對剖析之用；其次書院在各地的發展過程不斷地和當地既有的文化特色交流，在整合各種文化和民族傳統的過程中，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西南地區尤然。書院的發展尤其在官學化以後，稍具規模的書院，其功能和政府的州縣學校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同時，書院亦漸負有社會教育的功能，尤其當書院的發展逐漸集中於城市，甚至其後發展出與科舉考試相結合，清朝政府從教學管理上加強對書院的控制，書院在對於地方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書院的管理及運作上，清朝政府除了嚴格限制書院的設置地點，對於教師的聘任及學生的錄取考核皆訂有嚴格規範；其次，書院的學規絕大部分仍以「勸諭」為旨意，雖不免流於傳統處罰式的型式，至少仍能透過學規，對於入書院肆習準備科考的士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是有其正面的功能與價值。同時在經費籌措與運用上，透過官府撥款、私人捐助，甚而

西南地區當地裁汰土司之田業叛產等不同的經費來源挹注，使其賡續經營。書院在西南地區的發展難免須依附政府的力量，然而在政治力量之外，亦代表文化上兼容並蓄的精神，不斷與地方文化交流，帶動地方文化教育的發展。第三節〈科舉考試的優惠與防弊措施〉，科舉制度發展至清代，仍可見其對於文化教育發展的影響與推動，尤以邊疆地區更為顯著。通過對於邊疆地區的科舉中額之分配與增加科舉名目等措施，以及科舉與學校教育相結合，地方興辦學校、設義學，逐漸發展為學校培育的目標即為準備科舉，科舉考試的內容則遷動學校教學的內容。然而，優惠與防弊實屬一體的兩面，清朝政府在西南地區實行許多優惠措施之後，則予僥倖者可乘之機，諸多弊端應運而生，從而採取諸多相應的防弊措施。

第四章〈西南地區的學校教育—以義學為主的考察〉共分爲三小節，第一節〈義學之設置與發展〉，說明清朝由社學至義學的設置與發展，同時，清初壓制書院並不必然由義學取代之，而是在此背景下，社學、義學發展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義學逐漸取代社學而蓬勃發展，成爲清代主要的地方蒙學的教育機構；此外，還有另一類屬於官辦性質的義學，教學對象以少數民族爲主，「訓以官音、教以禮義、學爲文字、課以經書」，中央朝廷對於邊陲地區的基礎教育如此費心重視，主要在於欲透過社學、義學的廣泛設置，將朝廷的政治權力有效傳達偏遠的帝國神經末梢，一方面達到文教上移風易俗、宣揚王化，另一方面則利於政治上的管理與控制，並以四個階段說明清朝西南地區義學的發展。第二節〈義學的管理、教學與經費〉，分爲管理、教學及經費三部分說明義學的運作情形。基本上清廷對於義學的管理爲在政策上的管理及掌控，並將扶持、誘導和控制相結合。本節首先說明義學的教育目的、教師及學生的資格、待遇及考核，以及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課程內容及教材。最後探討義學經費的來源與運用，除了政府經費的資助，清代的社學或義學，基本上多爲官立或「公」立的；而私立的義學，大多獲得地方官員的資助。由於「官」或「公」經費對於義學的資助，使義學較能持續的發展。本節並分析捐助者身分，以及舉例說明經費的運用及管理情形。第三節〈西南地區義學發展的特點、成效及其意義〉，西南地區義學的發展特點爲，因政府的政策而得到有利的發展空間，並在皇帝諭旨及政府倡導下曾一度積極發展，義學的發展在許多部分可以觀察出政府力量的介入。其次，即便是所有蒙學設立的初衷在於「蒙以養正」，並非求得功名利祿，然而在現實環境的變化及影響之下，主客觀的需求促使義學等蒙學教育與地方官學的聯繫不斷增加。然而，清朝在西南地區還有另一類官辦的義學和一般義學在涵意上有些不同，爲官府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主要招收對象爲少數民族的子弟，啓發當地童蒙並爲進入官學作準備。除了國家政策的倡導及皇帝的諭令之外，各級官員的倡導與重視，直接參與義學的設置，視爲施政的要務；在地方官員的倡導下，各地衿紳紛紛起而效尤，使當地義學蓬勃發展，方能有所成效。最後分別就義

學在文教政策上、官學系統以及承先啓後的功能上闡述義學教育的歷史意義。

第五章〈清末新政時期西南地區的文教措施〉共分爲三小節，第一節〈清末的民族政策與文教政策的轉變〉，說明清朝政府透過行政管理政策的調整及推行「新政」政策實施清末的民族政策；文教政策亦在洋務運動與百日維新教育改革背景下，明訂教育宗旨，除了制定新學制及設立新的教育行政組織及新式學堂；同時廢除科舉、獎勵留學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爲清末新式學堂的推廣奠定基礎。第二節〈清季西南地區新式學堂的設立與運作〉，說明清朝政府以書院、義學改制學堂、私塾改良爲學堂及獎勵與處罰措施並濟等方式推展西南地區的新式學堂教育；清末新政對於西南地區現代化影響深遠者，就是文化教育上的變革，使傳統觀念向現代觀念轉型，有開啓民智的作用，大力推展新式學堂，邁出中國教育近代化歷程中極其重要的一步。在學堂的設立與發展過程中，採取獎勵與處罰並濟的措施，使西南地區各類新式學堂迅速發展，其中不乏配合當地民情，採取不按學部定章因地制宜的措施，設立頗具當地特色的新式學堂。在學堂的運作方面，不論在經費籌措、學校的管理及教學與課程部分亦顯現出這種特質。第三節〈清季西南地區的文教措施—以川邊爲例的考察〉，將以清末改土歸流主要的實施地區川邊爲例，考察清朝政府在川邊新式學堂及社會教化的推廣與改良，並試析清末經營川邊的積極意義與侷限性。

